

家祠、神庙与会馆：清前期西南“新辟夷疆”移民组织的运作机制*

李培娟

内容提要：移民会馆的形成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兴起过程与家祠、神庙关系密切，经过不同阶段的持续“层累”之后，才形成了我们如今看到的“馆庙一体”“一馆多庙”的格局。家祠、神庙与会馆的互动过程，直接反映了清初以降西南地方权力转移和移民在地化等历史节点的关键信息。东川府府城会泽县是中国“会馆最多的县城”，而湖广会馆是会泽县“八大会馆”之中建立时间最早、规模最为宏大者，其兴起过程见证了东川府铜矿业的日趋繁盛，其运作机制的变化亦折射出清前期“新辟夷疆”的地方权力变动过程。

关键词：东川府 家祠 神庙 会馆 移民组织

何炳棣在写作《中国会馆史论》时曾坦言，在其于北美所涉猎过的三千余种方志中，极少有会馆出现在方志的目录中，“方志中会馆的资料类皆隐藏在坛庙寺观等卷。江西、福建、广东、两湖、陕西会馆通常称作‘万寿宫’‘天后宫’‘南华宫’‘禹王宫’‘武圣宫’。”^①或许正是因为会馆这一社会组织的兴起和发展与坛、庙、寺、观等常常相伴相生、纠缠不清，部分学者逐渐把会馆和特定的神庙对应起来，把神庙简单理解为会馆的“别称”，有的学者在统计某地会馆数量时，甚至直接把区域内所有祠庙都理所当然地作为会馆。^②另有学者在研究会馆时，把神庙出现的时间作为会馆建立的时间，^③这些把会馆与神庙等同起来的研究，极易陷入线性史观“以今度古”的泥淖。

关于会馆发展演进问题的研究，作为明清会馆研究的“四大论题”之一，^④向来是明清社会经济史、会馆史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之一。何炳棣、王日根等学者已经对会馆的起源时间进行了严谨考证，^⑤基本上，会馆形成于明初到明中叶已经是学界的共识。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化和细化，学者开始关注会馆内部的变化，如王日根从形成、兴盛、蜕变三个阶段勾勒出明清时期会馆的动态发展概况；^⑥吴慧辨析了团行、会馆、公所等商人组织的性质，并对其演变过程进行了分析；^⑦黄忠鑫在对福州南台

[作者简介] 李培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广州，510275，邮箱：lpeij@mail2.sysu.edu.cn。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历史上的西南少数民族政权与国家整合研究”（批准号：LSYZD21010）阶段性成果之一。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感谢中山大学温春来教授、黄国信教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的悉心指导。

① 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68页。

② 吕维洪：《会泽八大会馆中的神祉崇拜及其文化意蕴》，《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文中把神庙和会馆直接等同，称云南省会泽县“共有108座会馆”。

③ 吴丹：《清以来会泽会馆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6年，第16、25页。文中认为云南东川府会泽会馆出现于明末，兴盛于清代；会泽县湖广会馆始建于明代晚期。

④ 王兴文、王红：《明清会馆研究的四大论题——基于近百年学界研究的分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2期。

⑤ 参见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13—15页；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34页。

⑥ 王日根：《明清时代会馆的演进》，《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⑦ 吴慧：《会馆、公所、行会：清代商人组织演变述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

的考察中,认识到神庙与会馆之间具有过渡性,早在会馆尚未建立以前,客商就以神庙作为“商业基地”。^① 这些研究为笔者的思考提供了诸多启发,但总体上来说,既有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视角上,重视宏观勾勒,较缺少具体地方的深入考察;^②时间上,注重会馆建立后与公所等形式的前后演变关系,较少对会馆形成初期之形态进行探索。笔者以为,选取部分移民会馆作为切入点,深入到其所在地进行考察,了解会馆形成初期更多的组织形态,从而认识会馆作为一种自发性极强的社会组织是如何落地生根并在基层社会中发挥其影响力,或许不失为一种必要的尝试。

目前对清代少数民族地区的会馆研究较少,而基于经济功能的解释也不足以覆盖“夷疆”的会馆史。移民到达“新辟夷疆”之后是如何一步步建立起会馆的?为何会馆内部除了供奉原籍神祇之外,还供奉其他神祇?“馆庙合一”“一馆多庙”的格局如何形成?神庙系统中的住持、僧人等与会馆系统中的客长、首事等群体之间又是如何进行互动的?对于这些进一步细化的问题,尚有待明晰。基于此,本文拟以“新辟夷疆”的典型代表、清代滇铜最重要的产区——云南东川府为例,利用田野中搜集到的会馆志书、碑刻、土地垦照、契约文书等民间文献,追溯会馆内部的历史变迁和权力转移过程,在对会馆的演变进行历时性梳理的基础上,窥其内貌,尝试探索以上问题。

一、清代东川府概况及现今湖广会馆的文本表达

清代的东川府位于滇、黔、川三省交界的滇东北地区,以铜矿著称,史载:“滇地多产铜,而东郡汤、大两厂所产甲于诸郡……京局鼓铸之供,东川为最。”^③在清代产铜最旺的时期,云南每年铜产量成为清政府铸钱所用铜料的主要来源地,当时云南“所铸出的钱约占全国铸钱额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而东川府是云南最为重要的产铜区,^④铜矿业的兴盛自然吸引了大量人口前来投资和就业,其中“最大的厂多至十万人”。^⑤与此同时,与铜矿业相关的伐木、采煤、烧炭、运输、米粮、油盐、布帛、铁具等其他产业也被催发,^⑥东川府一时间“民夷商贾,四方辐辏”。^⑦另一方面,康熙三十八年(1699)东川禄氏土司“献土改流”、^⑧雍正四年(1726)东川“由川隶滇”、^⑨雍正八年“讨平夷乱”^⑩等事件之后,东川府成为“新辟夷疆”,^⑪在一系列招垦措施的鼓励下,旁郡、邻省之人亦源源不断迁居东川。

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使得清代东川“会馆云起”,如今的东川府府城会泽县亦成为中国“会馆最多的县城”。^⑫在东川府的所有会馆中,湖广会馆“规模最大”,^⑬被称为“会泽八大会馆之首”。^⑭在现今的文本中,湖广会馆又被称为禹王宫、东岳庙、寿佛寺等,其布局如图1所示。

① 黄忠鑫:《从神庙到会馆:清代商帮祭祀场所的演变——基于福州南台的考察》,《宗教学研究》2019年第1期。

② 对于这一点,以往学者亦有同感。参见王兴文、王红:《明清会馆研究的四大论题——基于近百年学界研究的分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2期。

③ 乾隆《东川府志》卷11《厂课》,《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10册,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④ 全汉昇:《清代云南铜矿工业》,《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7卷第1期(1974年);严中平:《云南铜政考》,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23—24页。

⑤ 全汉昇:《清代云南铜矿工业》,《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7卷第1期(1974年)。

⑥ 温春来:《矿业、移民与商业:清前期云南东川府社会变迁》,温春来主编:《区域史研究》2019年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29—132页。

⑦ 刘藻:《东川府志序》,乾隆《东川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10册,第2页。

⑧ 乾隆《东川府志》卷3《建置》,《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10册,第27页。

⑨ 《云南巡抚鄂尔泰奏陈东川事宜折》(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7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⑩ 乾隆《东川府志》卷3《建置》,《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10册,第26页。

⑪ 《清高宗实录》卷54,乾隆二年(1737)十月丁酉,《清实录》第9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907页。

⑫ 卞伯泽:《会泽文化之旅——会馆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

⑬ 王日根主编:《中国老会馆的故事》,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版,第124页。

⑭ 朱君虎:《湖广会馆,一宝一奇三庙会》,云南省会泽县政协、会泽县历史文化名城民间研究会编:《名城研究》第7辑,2018年印行,第144—15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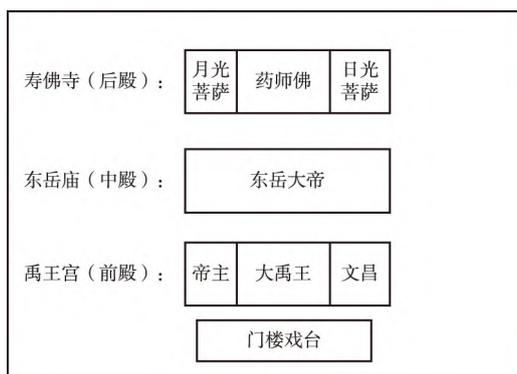


图1 现今的东川湖广会馆简图

总之,现今的湖广会馆是一个“馆庙一体”“一馆三庙”的综合体,其中的每一个神庙都可作为湖广会馆的“俗称”“他称”“别称”,而每个庙除了祭祀的神祇不一样,其他并无二致。如果把三个神庙分别标记为 A1、A2、A3,把会馆标记为 B 的话,则现今文本中的神庙与会馆之间是 $A1 = A2 = A3 = B$ 的关系。^① 这种格局的形成,以及关于湖广会馆和东川府历史的文本和表达,正是本文关注的不同时期历史事件不断累积后的结果。下文中,笔者将以东川湖广会馆的形成和运作为主线,窥视清前期西南移民社会的历史。

二、亦祠亦庙:移民到达之初建立的社会组织

东川湖广会馆作为一个移民性质极强的同乡会馆,研究其历史演变,无疑需要从移民入手。有观点认为湖广会馆首建于明末,^②这恐怕与事实有所出入。在笔者目之所及的史料中,没有任何关于明代东川湖广会馆的记载,且东川府于康熙三十八年才开始改流,汉人和客民数量寥寥可数。康熙三十九年,“府城内汉民二十余户,客民百余户,悉无家室,去来无定。”^③至雍正五年,东川府仍“夷多汉少”,^④“新经改归,俱系夷户,并未编丁”。^⑤换言之,直到雍正年间,东川府的客民数量极为有限,故几乎不可能于明末在府城建有湖广会馆。我们无法确定湖广客民进入东川的具体时间,但结合东川地方社会发展的实际,一定规模的客民群体形成应该是在康熙三十八年东川改流之后。

关于早期到东川的湖广移民之生活状态,最早的记录见于《东川湖广会馆传书》^⑥中的一份讼词,其中有云:“蚁等楚民托庇治邑,建立家祠,人人捐资,童叟有分。每虞常住之歉薄,恒虑香火之相继,岂忍任听侵占、坐视剪灭,为后人唾骂,致神明阴遣者哉?”^⑦这份讼词以湖广客民的口吻来追忆他们初到东川时的状况,言辞恳切,虽寥寥数语,却提供了早期移民生存状态的丰富历史情境:第一,来自湖广的移民自称为“楚民”,他们到了东川之后,首先建立的并不是会馆,而是家祠。第二,建立家

① 这些文本普遍出现在当代学者特别是一些地方文史工作者的论著中,在当地文旅部门的宣传资料中亦较常见。参见梁晓强校注:《〈东川府志·东川府续志〉校注本》,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9 页;卞伯泽:《会泽文化之旅——会馆文化》,第 71—83 页。

② 吴丹:《清以来会泽会馆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6 年,第 16、25 页;黄滢、马勇主编:《中国最美的古城:古城格局、古建筑保护与营销推广》,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14 页。

③ 乾隆《东川府志》卷 8《户口》,《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 10 册,第 66 页。

④ 《清世宗实录》卷 61,雍正五年九月庚辰,《清实录》第 7 册,中华书局 1985 年影印本,第 942 页。

⑤ 雍正《云南通志》卷 9《户口》,《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69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263 页。

⑥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共 6 卷,卷 1 和卷 5 已不知所踪,卷 2、卷 3、卷 4、卷 6 现藏于云南省会泽县图书馆。关于其成书时间,会泽县文史工作者卞伯泽有“乾隆四十七年”和“乾隆四十八年”两种说法(详见卞伯泽:《会泽文化之旅——会馆文化》,第 438 页),但笔者发现,卷 3 之《东川湖广会馆传书跋》的落款时间为“乾隆甲辰岁元旦后十日”,“乾隆甲辰”实为乾隆四十九年,结合此处落款时间及卷 6 之《催收功德尾欠并议修葺传书壁单》,笔者认为该书的成书时间应为乾隆四十九年。

⑦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 2《拖罗田地·县主批详》,第 23b 页。

祠的资金来自于“人人捐资，童叟有分”，即男女老幼自行捐资，结合地方社会当时的发展实际，这种家祠组织应该是民间色彩比较浓厚的一种自发性组织，且应该是一种由不同姓氏的移民组建的异姓家祠。第三，这个众人捐资建立的家祠，有自己的“常住”产业（即公产），而“常住之歉薄”会导致“香火之不继”，说明此时公产的规模应该比较有限。第四，面对田产被侵占的状况，湖广客民诉诸官府，发出“岂忍任听侵占、坐视剪灭，为后人唾骂”的愤慨，潜意识中凸显了前人初期置业时筚路蓝缕的艰辛。第五，家祠的产业被侵占之时，客民们最担忧的是“香火不继”“后人唾骂”“神明阴谴”，说明初期的家祠中供奉有神祇，虽不能判定当时的“神明”到底是祖先还是其他神祇，但似乎可以看到初期的移民组织在功能上有家祠与神庙相结合的趋向。

其他一些史料中也不断出现与家祠相关的一些表述。乾隆二十二年的一份《立改过字》中载：“立改过字。僧性常，情因寿佛寺历年由单、契券，合省验过，存庙交僧，此乃家祠定规。”^①乾隆三十六年《募捐重修会馆引》中，则更直接地透露出湖广会馆之前身“固家祠也”，“东郡之有三楚会馆，固家祠也，一楚望也。溯创建于昔人，实思巩固，百代裕贻，谋于来许，正谓克守先徽，此前修不坠，而明禋常昭乃者。”^②此外，还有一通现存碑刻亦是“家祠”曾经存在的实物力证。乾隆三十年，禹王宫竣工时，特立《新建禹王宫重修家祠碑》，^③碑额中“新建”和“重修”二词，说明在乾隆三十年以前，禹王宫是不存在的，而“家祠”是确切存在的，否则也不会有“重修”之说，从乾隆三十年“重修”的背后，或可知家祠的建立时间已不短，还可想见之前家祠已经残破，抑或是规模太小，已经不适应现实需求。

总之，在湖广会馆形成的早期，曾存在一个既是家祠、又是神庙的组织，这个组织或许是以神庙作为活动场所，以家祠作为组织形式。至于为何把神庙作为家祠，笔者推测，一方面，初期客民来到迁入地之后，可能把祖先的牌位带到迁入地，在无力建立家祠的时期，人们或许直接把祖先牌位供奉于神庙中；另一方面，据《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可知，早期移民流动性非常强，生活条件艰苦，生死颇难预卜，他们经过山水迢迢到达迁入地之后，一部分人定居下来，但也有不少人又返回原籍，或是客死异乡，这些人去世之后把财产捐给神庙，而神庙可能负责供奉其牌位。例如，湖广宝庆府柳国山在东川去世之后，“所遗田土、荒地、山岭无人承受”，于是捐入寿佛寺，“以作逐年七月半国山香灯烧纸之费”。^④凡此种种，使得神庙和家祠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需要说明的是，家祠与神庙并没有非常严格的先后顺序，它们在基层社会中往往呈现出相互寄居的状态，而在日常称呼中，人们往往沿用老的称呼，或使用能最大程度体现自身心理需求的称呼。

三、僧人代管：早期的神庙及其内部管理

如前所述，在湖广会馆正式形成之前，来到东川府的湖广客民以捐资等形式建立起一种“亦祠亦庙”的社会组织，而这个组织中的“庙”到底为何庙，组织内部又是如何运作的呢？要了解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先来追溯后来文本中出现的“寿佛寺”和“东岳庙”的历史。

（一）寿佛寺

囿于史料阙如，我们无法知晓湖广会馆内的寿佛寺最早建于何时，但或可从东川府的佛教信仰中得到解读。寿佛寺的建立与当地的佛教信仰密切相关，这是毋庸置疑的。实际上，东川府早有佛教信仰的传统，对于佛教神祇多有供奉，如府城内的如来寺“在金钟山下孟琰祠前，每岁四月八日夷人演戏酬愿，祀之惟谨”。距离府城一天路程的娜姑地区，亦有关于“观音送水”的佛教故事：“东

①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2《僧性常改过字约及状词官批等项》，第54b页。

②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3《募捐重修会馆引》，第3a页。

③ 《新建禹王宫重修家祠碑》（乾隆三十年），现存于云南省会泽县古城内湖广会馆旧址，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温春来教授于2012年田野调查时所录。感谢温老师提供的诸多材料。

④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2《水坪子田地山岭》，第32a—32b页。

川改土归流时,那姑树卑古地方无水,忽有一老妇向夷妇化斋,答云有米无水,老妇云何难,遂以手杖向岩边数画,倏时清泉流出,后遂溉田数十亩,至今有观音寺祀之。”故事中的“观音”化作老妇,为“夷妇”解决了缺水难题,可见原住民的观念中亦有佛教信仰的成分。而位于府城外的五里村和十里村还有两个寿佛寺,可见寿佛寺不仅在府城之内存在,在府城之外亦有分布。^①从当地的习俗、传说故事以及后来的方志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佛教并不是外来移民大规模进入东川之后带来的信仰,而是其固有之信仰,且寿佛寺也并非仅东川府城内这一处,而是遍及府城之外的村落。

关于湖广会馆内寿佛寺的较早身影,在《禹王宫碑》(乾隆三十二年)中可寻见蛛丝马迹。碑文追溯湖广会馆早期的历史时说:“滇东城东关外寿佛寺……吾楚来滇之人一会集处也。”^②可见寿佛寺是楚人来到东川后的一个移民据点。又据一份官方颁发的土地“垦照”所载,康熙四十六年二月十七日,湖南衡州府费常璋把一处位于水城的庄田施给寿佛寺,^③可知后来湖广会馆中的这个寿佛寺至迟于康熙四十六年已然存在。

综上,笔者认为,寿佛寺应该是康熙三十八年东川改流之前或改流之初已经存在的,至迟不会晚于康熙四十六年,湖广移民辗转到达东川之后,很可能把这里当作一个会集的场所或是中转站,又从这里扩散到府城之外的矿区和乡间。

(二) 东岳庙

雍正《云南通志》将东岳庙列入“群祀”,并称:“东岳庙,在府城东门内,本朝康熙三十九年建。”^④这个时间还是非常可信的,因为东岳庙以泰山东岳大帝为祭祀神祇,根据赵世瑜的研究,东岳庙普遍见于全国各地的各级城市(而非乡村),向来带有较强的官方正祀的性质。^⑤在笔者对湖广会馆进行田野调查时,会馆内的卯姓道长亦告诉笔者,东岳庙以前是“官庙”。^⑥

东岳庙这种官方正祀的性质,可能也是其被建在府城东门附近的原因。康熙三十九年正是东川府改流之后的第二年,在此处修建具有官方正祀象征意义的东岳庙,并由官方参与祭祀,可谓顺理成章。乾隆《东川府志》亦载:“东岳庙……每岁立春前一日迎土牛于此,五月谷日、三月二十八日致祭。”^⑦这个立春前的“迎土牛”仪式,便是明清时期全国各地盛行的“鞭春”。遍检明清府县志书中的“祀典”部分,有关地方官员参与“鞭春”仪式的记载十分常见,在与东川相邻的云南嵩明州,亦有“立春前一日,具彩仗,迎芒神、土牛于东郊迎春亭,迎入州署,行礼,次日审时鞭春”的习俗。^⑧“鞭春”仪式由府县官员主持,于立春前一日到东川府城东门附近的东岳庙祭拜句芒神,隶役把事先准备好的土牛抬入府衙的彩棚内,谓之“迎春”。次日立春时,又把土牛抬出,用木棍把“春牛”打碎,谓之“鞭春”或“打春”,围观的人群会抢夺打碎的土块,“据说此土块放于自己的田或地中会使农田丰收”。^⑨这样的仪式活动让官员和民众共同参与,无疑是一个强化国家认同、推广农耕文化的绝佳时机。

综合东岳庙的性质以及在此举行的仪式活动,可知东岳庙建于康熙三十九年,带有较强的官方正祀的性质,可谓改流之后官方文化在东川府展演的场所。对于地方社会以及移民组织而言,崇祀

① 以上参见乾隆《东川府志》卷7《祠祀》,《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10册,第64页。

② 《禹王宫碑》(乾隆三十二年),现存于云南省会泽县古城内湖广会馆旧址。

③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2《水城田庄》,第6b页。

④ 雍正《云南通志》卷15《祠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9册,第446页。引文中的东岳庙即是湖广会馆中的东岳庙,因为在实地田野调查中,湖广会馆内的东岳庙正位于东川府城东门附近,且周围有且仅有这一个东岳庙。

⑤ 赵世瑜:《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顶”与东岳庙为个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⑥ 采访人:李培娟。采访对象:卯姓道长,长年居住于东川湖广会馆内,参与湖广会馆的经营管理以及周边地区的法事活动。采访时间:2019年2月14日。采访地点: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古城内湖广会馆旧址。李培娟笔录保存。

⑦ 乾隆《东川府志》卷7《祠祀·群祀》,《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10册,第63页。

⑧ 康熙《嵩明州志》卷5《典礼志》,康熙五十九年刻本,第14a页。

⑨ 卞伯泽:《会泽文化之旅:古城遗韵》,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2页。

这种具有官方正统性象征的神明,也不失为一种改变社会地位的文化手段,甚至东岳庙的存在或许正是客民寻求自我合法性存在的巧妙“包装”。

至于寿佛寺和东岳庙孰先孰后,我们无从确定,但是孰轻孰重则可推知。从湖广会馆的内部资料——《东川湖广会馆传书》以及留存的清代碑刻来看,“东岳庙”很少单独出现,而是以“寿佛寺东岳庙”的文本形式出现,“寿佛寺”通常在前,“东岳庙”往往居后。且在湖广会馆的所有房屋、田产契券中,出现的也是“立合同人寿佛寺”^①以及“召到寿佛寺承买为业”^②这样的叙述。作为湖广会馆这一“控产机构”的“法人代表”,一直是寿佛寺,而非东岳庙。可见,在湖广客民的意识中,寿佛寺更能代表其最切实的利益。从内部管理者来看,在不同时期,“寿佛寺东岳庙住持真彻”“寿佛寺东岳庙住持僧如性”的表达亦很常见,可知寿佛寺和东岳庙背后的住持僧人是同一个,寿佛寺和东岳庙的关系类似于“两个机构、一套人马”的架构,两个神庙的结合,体现出民间信仰与官方祀典的微妙互动。

(三) 神庙的内部管理

前已叙及,家祠、神庙得以建立,赖于湖广客民“人人捐资,童叟有分”,充满了筚路蓝缕的艰辛,后来源源不断的产业捐施者,也都是来自湖广的客民,那么,家祠、神庙的产业所有权,无疑属于参与捐资的全体湖广客民。另外,可以非常明确的是,住持僧人曾在产业经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印证:其一,作为产业凭证的由单、契券,在客民查验过后,存放在神庙中,由神庙的僧人来进行保管,并已成为一项实行多年的“定规”：“寿佛寺历年由单、契券,合省验过,存庙交僧,此乃家祠定规,原上交下接,轮流经查,毫无有失。”^③其二,僧人是名义上的产业代理人。这在湖广会馆留存下来的诸多“遵照”、^④施白中有所体现。在康熙时期以及乾隆早期,这些垦照、施白等都是颁发给寺庙及僧人的,持照者中并未出现客长、头人、首事等人群,如表1所示。其三,僧人负责对常住产业进行经营和管理。如康熙五十九年,湖广客民邓三英久病难愈,将其产业施入寿佛寺,其中有一块荒地,住持僧人即“募化牛工,于本年开凿成地”。^⑤再如雍正元年,“有住持僧如性募化工本,将陆地内开成水田八亩”,开垦好之后僧人又向官府申请了遵照、由单,之后又把土地租赁给“猓佃”戈着、颇第、魏涵元、者得、颇塔等人分耕,佃户则“按年上纳租谷,交与住持僧收用”。^⑥湖广会馆这种依靠寺庙及僧侣来管理产业的运作模式并不少见,同城内的关西会馆亦“龔金置田□□,住持典守其事”。^⑦可见僧人负责对产业进行拓展和维护,并直接收取利益。

表1 康雍时期及乾隆早期产业凭证中的僧人

时间	文本	资料来源
康熙四十六年 二月十七日	“为此照给寿佛寺东岳庙住持遵照事理”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2《水城庄田·遵照》,第7b页
雍正元年 九月十五日	“右照给寿佛寺东岳庙住持僧如性”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2《拖罗田地·遵照》,第15b页
乾隆二十六年 十月二十日	“右照给寿佛寺住持僧雨南遵守”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2《水坪子田地山岭·施白遵照》,第34a页
乾隆二十八年 八月十五日	“本寺住持僧雨南、自玉收执管业”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2《歹戈田庄·施白上首契约》,第37b—38a页

- ①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2《水坪子田地山岭》,第34a页。
- ②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2《以舍田地》,第42a页。
- ③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2《僧性常改过字约及状词官批等项》,第54b页。
- ④ “遵照”,又称“垦照”“垦单”等,是官府颁发的一种土地凭证。拥有了垦照,即意味着拥有了官方承认的土地合法产权。
- ⑤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2《拖罗田地·遵照》,第14a页。
- ⑥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2《拖罗田地·厅主勘察详报》,第20a页。
- ⑦ 《关西会馆碑记》(乾隆四十六年),此碑现作为建筑石料镶嵌于云南省会泽县古城内福祿寺西侧墙壁上。

综上所述,在湖广会馆的早期雏形中,神庙系统中的僧人作为产业的代理人,不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也是切实的经营者。在移民到达的初期,移民与僧人之间尚能建立一种相互信赖的关系,同乡籍人可以较放心地依赖僧人来处理移民组织的内部事务,这种“僧人代管”的模式或许较同乡籍人自己来处理更为有效。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客民的经济实力、政治实力日渐增强,移民组织的规模也由简陋而增宏,“僧人代管”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

四、旧轨难循:移民势力的壮大与“僧人代管”模式弊端的凸显

乾隆二十四年是湖广会馆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一年,这一年发生的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后来成为了湖广会馆内部转型的机缘。

(一) 禹王宫的新建

乾隆二十四年,有人提议在寿佛寺前的闲置空地上建禹王宫,壮大楚人声威。此事《禹王宫碑》(乾隆三十二年)有载:“乾隆己卯秋,吾楚有乡老视寺前已余地数亩,坦然一园,其气局旨弘敞、眼界旨宽阔,乃欣欣然曰:‘斯地也,曷使其闲,胡不重建禹王、帝主宫殿,愈壮吾楚旨嘉会矣?’”^①提议修建禹王宫的“乡老”显然不是一般的老乡,很可能是客民中经济实力或组织能力较强,因为这个工费浩繁的项目马上被提上了议程。在同乡决议之后,款项的募集也循序展开,如《禹王宫碑》中所载,“各首持帑,广募于楚中乡友,共襄兹举。”《新建禹王宫重修家祠碑》又载,募捐之后的第二年冬天,“同乡诸人遂协为经营,庀才鸠工,圯者修,废者补,用展规格,又于新建殿前启演剧一台。”乾隆三十一年,禹王宫终于落成。^②自此,作为湖广客民故地神祇的大禹王、帝主在东川府得到供奉,后世文献记载中的“禹王宫”也是在此时才出现的。禹王宫历时六年建成,气势宏伟,府城之外的汤丹、落雪、大水沟等各大矿厂的湖广客民均有捐资,此时的神庙不仅仅是楚民来东川的一个移民据点,还成了湖广人的一个象征。^③

(二) 客民与僧人的诉讼案

也是在乾隆二十四年,湖广客民把寿佛寺的僧人告到了官府,起因是一起偷窃案件。这起诉讼案的原告为以詹孔生等八人为代表的湖广客民,被告是法号为性常的寿佛寺僧人。湖广客民称性常不仅“夜宿俗家,淫行无所不为,不守清规”,还“私窃由单、遵照、田契、绘图盗卖”,又“盗卖租谷银七十余两”,甚至在积蓄了一定的资金、当上僧官之后,作威作福,“动逞恶态”。^④在讼词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湖广客民对僧人素质、忠诚度、管理能力的严重怀疑,僧人代为管理产业的运作模式,已经弊端丛生,难以再续。

面对湖广客民“声泪俱下”的控告,官府对此案的批示为:“寿佛寺田土什物,原系汝等龛金捐置,当初容其住寺接受庙产,亦系汝等自行允许,并非经官所断。汝等私事,去留由汝,官府亦不便过问……汝等即将性常逐出,另招可也。”^⑤这份批示先说“寿佛寺田土什物,原系汝等龛金捐置”,道明寿佛寺的田土什物为湖广客民所有,充分肯定了湖广客民的产业所有者身份;又说当初湖广客民容

^① 《禹王宫碑》(乾隆三十二年),现存于云南省会泽县古城内湖广会馆旧址。碑文中乾隆己卯年(即乾隆二十四年)的“重建”似乎与前文《新建禹王宫重修家祠碑》(乾隆三十年)的“新建”相矛盾,但笔者认为实际上并不矛盾,原因有二:一是,从《禹王宫碑》中可知,乾隆二十四年之前,此地是一块闲置空地,“余地数亩,坦然一园”,为了利用这块空地,乡老提议建禹王宫,换言之,在提议之前,这块空地上并没有禹王宫。二是,《禹王宫碑》的内容是以湖广籍一位乡老的口吻来诉说,乡老所谓“胡不重建禹王、帝主宫殿”,应该是说之前湖广原籍有禹王、帝主宫殿,而东川没有,因此希望在迁入地重建供奉原籍神祇的禹王、帝主宫殿。

^② 关于禹王宫的落成时间,《新建禹王宫重修家祠碑》言“乙酉(引者注:乾隆三十年)工竣”,《禹王宫碑》则言“丙戌(引者注:乾隆三十一年)秋始庆落成”。笔者认为这两种说法并不冲突,因为此次修建“工费浩繁,难期速成”,所以是“渐次修造”的,很可能是乾隆三十年完成了主体工程,三十一年其他杂项也结束。为稳妥起见,笔者以乾隆三十一年为禹王宫竣工时间。

^③ 温春来:《矿业、移民与商业:清前期云南东川府社会变迁》,温春来主编:《区域史研究》2019年第2辑,第121—124页。

^④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2《僧性常改过字约及状词官批等项·原词》,第56a页。

^⑤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2《僧性常改过字约及状词官批等项·奉批》,第57a页。

许僧人住在寺中管理庙产“亦系汝等自行允许”，认定僧人乃是湖广客民自行任用，自然可以自行裁决、“去留由汝”，揭示了僧人只是代为管理产业的经营者角色。字里行间的弦外之音，可看出官府明面上“不便过问”，实际上已经把案件的主动权交给了湖广客民。有了这份批示，湖广客民从僧人手中收回管理权成了水到渠成之事。

综上，随着禹王宫的修建以及与官方势力的结合，湖广会馆的势力逐渐壮大，姑且不论上文的诉讼案孰是孰非，湖广客民隐忍已久，僧人代管产业的模式弊端凸显、旧轨难循，客民想收回产业的管理权应该已是不争的事实。湖广客民捐资置业，也承担产业经营不善、甚至资产化为乌有的风险，是风险的实际承担者；神庙内的僧人一度拥有产业的经营权，但大概到了乾隆二十四年，经过几十年的积累，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这种经营方式难以为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为管理者的僧人素质低下、管理能力欠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湖广客民在危机的处理中联合官方的力量驱逐僧人，收回僧人手中的权力，亦是规避风险的表现。

五、从神庙到会馆：地方权力的转移

若从康熙三十九年算起，至乾隆二十四年，僧人代管的经营模式已存在了半个多世纪。大概经过了两代人之后，在湖广会馆的契券、遵照、施白等资料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之前未出现的客长、头人等角色，并逐渐成为掌握实权之人，而湖广会馆也逐渐走向了“辉煌”时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一）会馆规模的扩展

会馆实体建筑规模的扩大，无疑是客民经济实力的体现。从乾隆二十五年到三十一年，经过六年的施工之后，禹王宫落成，但湖广会馆的建设并未止于此。乾隆中后期湖广会馆的迅速崛起，从其建筑规模的扩展中可得到直观反映。在禹王宫初步落成时，已显示出富丽堂皇的气质，《新建禹王宫重修家祠碑》（乾隆三十年）称其“取材则梗口杞梓，庙貌巍峨也；绘事则黝恶丹漆，金碧辉煌也”；禹王宫完工后，新的《禹王宫碑》（乾隆三十二年）碑文中进一步描述了禹王宫气势恢宏的景象：“殿貌辉煌，栋宇壮丽，□□墙垣，焕然一新”。据《新建禹王宫重修家祠碑》（乾隆三十年）载，湖广会馆首次形成了“神禹、东岳、寿佛为之坐镇而护佑”的局面，奠定了后来湖广会馆与禹王宫、东岳庙、寿佛寺三个神庙“馆庙一体”的格局。也就是说，后人所见之湖广会馆“一馆三庙”的格局，是乾隆三十年之后才形成的。寿佛寺最初建立的确切时间我们无从考证，但即便从康熙三十九年东岳庙建立起算，这个格局的形成也经历了六十多年。乾隆三十六年，会馆发布了《募捐重修会馆引》，倡议商民捐资重修会馆，“分冰剖雪，勿惜小费”。^① 总体来看，乾隆三十年之后，会馆规模进一步扩大，详见表2。

表2 乾隆三十年之后湖广会馆的建设情况

时间	修建项目	资料来源
乾隆三十一年	禹王宫竣工	《禹王宫碑》（乾隆三十二年）
乾隆三十六年	开始建造正殿、东西两廊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6《催收功德尾欠并议修葺传书壁单》，第1a页
乾隆四十三年	粧塑金像、彩画、油漆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6《催收功德尾欠并议修葺传书壁单》，第1a页
乾隆四十六年	修建财神殿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6《催收功德尾欠并议修葺传书壁单》，第1a页
乾隆四十八年	修观音大士像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6《修观音大士像免各善信女捐目》，第20a页

需要说明的是，表2所列仅为比较大型的项目，实际上，从乾隆三十年之后，会馆一直在进行一些诸如修墙脚、上梁、竖扇等小项目，还逐年添置桌凳、瓷器等家具。^② 会馆建筑规模扩展和内部装潢精致，无疑是移民定居化过程中对其发展成就的自我展示，不同籍的移民群体之间、移民与土著之间不断竞争、合作，会馆建筑的争奇斗艳也是各类人群之间复杂关系的体现。更重要的是，从倡议的发

①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3《募捐重修会馆引》，第3b页。

②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6《计开逐年出用总数》，第5a、6a、6b、7a页。

起到资金的募集,再到修建日期的择定,又到工程的监督管理,随处可见首事的身影,“首事督修”成为工程顺利开展的有力保障。^①

(二) 官方力量的持续加持

会馆势力的不断增强亦可从会馆重大活动的参与者之身份地位得到证明。最突出的是,乾隆三十年禹王宫竣工,特立《新建禹王宫重修家祠碑》,此碑由“赐进士出身、鸿胪寺卿、督理云南粮储道加五级、纪录十六次罗源浩”撰文,并由“中宪大夫、知东川军民府事、前临安府正堂、军务加三级、随带纪录二次、又纪录十二次方桂”以及“昭通府口寨巡厅、署则补巡厅、兼管钱局厂务事、纪录四次、计大功一次何达宪”书写。“罗源浩”“方桂”“何达宪”这三个名字之前冗长的职衔颇有会馆以官员来“壮门楣”的意味。东川府会馆众多,会馆总数在云南名列前茅,^②湖广会馆能请到云南粮储道、东川府知府以及隔壁昭通府的官员显贵来撰文和书丹,可见当时湖广会馆在地方上非同一般的势力,以及与官方力量的互动。

不仅如此,在一些零碎史料的踪迹中,我们还可窥见更多湖广会馆与清政府官员密切交往的细节。如上文已提及的罗源浩,其于乾隆二十四年来到东川;乾隆三十年为禹王宫撰写《新建禹王宫重修家祠碑》碑文;乾隆四十年,罗源浩离开东川府时,湖广会馆赠其“赉银”200两,还赏给其随从人员银50两,并举办了请客吃饭、演戏等活动,这笔不小的开支被如实记录在湖广会馆当年的账簿中。^③与湖广会馆有经济往来的官员不止罗源浩一个,如乾隆四十五年汤姓官员到东岳殿上匾,湖广会馆赏其从役银15两,此事在当年湖广会馆的账簿中,亦清晰记有“迤东道汤□□上东岳殿匾,赏给从役银十五两”字样。^④

无论如何,各级官员与湖广会馆有过密切往来当是事实,这很可能为湖广客民在东川势力的进一步壮大提供了更好的条件。湖广会馆不惜重金直接或间接取悦官员,他们背后的人情、利益关系亦可想见。总之,湖广会馆的发展壮大与官方力量的加持几乎是同步推进的,他们之间相互促进。正是在官方、客民等复杂力量的多方互动下,湖广会馆在乾隆中期以后迎来了持续的繁荣。

(三) 客长、头人成为会馆产业的实际经营者

除会馆实体建筑规模的扩展外,会馆所拥有的产业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详见表3。

表3 湖广会馆的产业来源情况

时间	产业名称	产业来源	备注
康熙四十六年	水城田土	衡州府费常璋施入	捐施
康熙五十九年	拖罗田地	宝庆府邓三英施入	捐施
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翅落田地	郴州府谢老实室人丁氏施入	捐施
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十一日	水坪子田土、荒地、山岭	宝庆府柳东海施入	捐施
乾隆二十五年四月十四日	苦片房屋	衡州府衡山县单士元、单彩玉施入	捐施
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洒海村田地	衡州府清泉县徐圣传施入	捐施
乾隆二十八年	歹戈田庄	武昌府江夏县毕其珠施入	捐施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以舍村田地	萧李氏(以舍村人)所卖	买入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初二	以舍村基地、菜园	黄凤鸣(以舍村人)所卖	买入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碧古坝熟田	段崇禄(碧古坝大桥段家村大寨人)所卖	买入

资料来源:据《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2《水城田庄》《拖罗田地》《翅落田地》《水坪子田地》《歹戈田庄》《以舍田地》《碧古坝大桥段家村田地》(第5a、12b、9b、31b、36b、39a、41b、45a、47a页)相关内容整理。

①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3《募捐重修会馆引》,第3b页。

② 马晓粉:《清代云南会馆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12—113页。

③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6《计开逐年出用总数·乾隆四十年内用项》,第8b页。

④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6《计开逐年出用总数·乾隆四十五年内用项》,第14a页。

从表3可见,乾隆三十年之前,湖广会馆的产业主要来自湖广客民源源不断的捐施;乾隆三十年以后,湖广会馆的产业来源发生了新的变化,客民开始积极到离府城更远的地方购买田产、房产,不断拓宽收入渠道,为会馆的日常开支增加稳定的收入来源。而在买入产业的过程中,客长全程主导,从《东川湖广会馆传书》所载乾隆中后期的施白、田契等来看,签订施白、契约的“户头”虽然依旧是“寿佛寺”,但是施白、契约中逐渐不再出现僧人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客长、头人等。乾隆四十五年湖广会馆给萧李氏买田地的一份田契中明确提到,“自卖之后,任凭闾省客长、头人投税拨册,更名输赋。”^①其他契券也显示出类似的特点。

总之,随着湖广客民经济实力的增强,在乾隆二十四年以后,会馆建筑规模大幅扩展,在官方力量的持续加持下,会馆的经营权逐渐从僧人手中转移到湖广客民手中,客长、头人、首事等成为湖广会馆新的代理人和经营者,主导着会馆建筑的建设和会馆资产的运营。“寿佛寺”虽然还是户名,但是神庙显示出被“边缘化”的趋势,在资产管理中逐渐失势,僧人的名字也渐渐在施白、契券中隐没了。

六、结论

在现今的文本中,禹王宫、寿佛寺、东岳庙都是东川湖广会馆的“别称”,三个神庙除了供奉神祇的不同,其他并无二致。实际上,家祠、神庙和会馆并不是天然结合在一起的,而是不同时期历史事件层累之后的结果。前人往往会忽略对会馆形成初期的历史回溯,把家祠、神庙和会馆的“相伴相生”当作理所当然的现象。探讨会馆形成之初的早期历史,对于认识清前期西南社会的变迁以及移民社会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以东川湖广会馆为例,试图将不断层累的文献回溯到当时当地的历史情境中,从留存下来的会馆志书、碑刻等史料的蛛丝马迹中探索清前期西南地区移民在地化的历史。通过考察,我们发现,大概在康熙三十八年东川改流之前或改流之初,寿佛寺已经存在,湖广移民到达东川之后,把这里当作一个会集的场所,寿佛寺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原住民与新进客民相互衔接的历史;康熙三十九年,代表官方祀典的东岳庙建立,官方在此举行“鞭春”仪式。初期的湖广客民以寿佛寺、东岳庙为依托,建立了一种“亦祠亦庙”的控产组织,这个组织以“寿佛寺”为户名,其资产及契券由神庙中的僧人保管,资产亦由僧人来运营,但随着产业的不断增加以及客民人数的增多、经济实力的增强,这种“僧人代管”运作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

乾隆二十四年是家祠、神庙转型到会馆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客民与僧人的诉讼争端之后,客民在官方力量的巧妙支持下,掌握了产业的所有权和实质经营权,并开始修建具有湖广客民象征的禹王宫,强化身份认同。乾隆三十一年,禹王宫落成,“一馆三庙”的格局正式形成,会馆之名与会馆之实更加凸显,湖广会馆进入辉煌时期。在客长、首事等人的经营下,会馆拓宽了收入渠道,同时积极与官方互动。可以说,禹王宫代表的是客民落地生根之后蓬勃生长的历史,显示出基层社会的活力。而祠庙向会馆转化的深层原因,与其说是祠庙弊端的凸显,不如说是移民经济实力增强后对产业经营权的追回。当然,在东川府的众多会馆中,湖广会馆的建筑规模、产业规模之所以如此突出,其基本原因仍在于经济实力的强劲,同时也离不开其背后的政治实力和社会影响力。

这种由家祠、神庙发展而成会馆的移民组织运作机制并非东川湖广会馆所特有,其他会馆与湖广会馆的经历亦有一致性。东川府城内的江南会馆在清前期仅为一个祭拜华佗的小庙,后来不断添建,增加白衣阁、关帝庙等,^②直至乾隆二十六年^③仍然是由三个庙宇结合而成的复合体,丝毫不见江

^① 《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卷2《以舍田地》,第43b页。

^② 乾隆《东川府志》卷7《祠祀·寺观附》,《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10册,第64页。

^③ 此年为乾隆《东川府志》成书之时间。

南会馆的踪影,江南会馆的真正形成,甚至要到民国初年。^①东川府城之外的会馆亦有相似的发展逻辑。如在东川府城外的娜姑镇白雾村,原籍江西临江府的邹氏兄弟四人因经营药材、碗花于乾隆元年入滇,之后与同籍肖、谢、罗、丁、管、邬、朱等九姓筹资建盖庙宇,当地人统称为江西庙,这个庙宇后来便发展为白雾村的江西会馆,^②至今遗址尚存。有理由相信,在清代其他地区的会馆发展历程中,亦不乏类似的现象,但还需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

厘清会馆形成初期与家祠、神庙等的内在关联问题,其意义不止在于考证孰先孰后,更在于通过会馆这一组织形态的内部变化,了解“馆庙一体”现象的形成过程,进而认识移民社会发展与会馆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东川府湖广会馆的经验表明,清前期西南“新辟夷疆”的移民组织呈现出多层次、系统性的运作机制,这里的会馆固然有其商业上的功能,但更多是一个移民的据点。一方面,会馆的形态会随着移民扩张的进程而演变;另一方面,会馆也能够折射出移民“再组织”的进程,其对于促进移民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与融合意义重大。

Family Ancestral Halls, Temples and Guild Halls: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of the “New Frontier” Immigration Organization in the Southwest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Li Peijuan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immigrant guild halls is often not achieved overnight, and its rise process is closely related to family ancestral halls and temples, and after continuous “layering” at different stages, it has formed the pattern of “one museum and temple” and “one museum and many temples” that we see today.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family ancestral halls, temples and guild halls directly reflects the key information of historical nodes such as the transfer of local power in the southwest and the localization of immigrant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Dynasty. Huize County, the capital of Dongchuan Prefecture, is the county with the most “guild halls” in China, and the Huguang Guild Hall is the earliest and grandest of the “Eight Great Halls” in Huize County, and its rise has witnessed the increasing prosperity of the copper mining industry in Dongchuan Province, and the changes of its operating mechanism also reflect the local power change process of the “New Frontier”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Keywords: Dongchuan Prefecture, Family Ancestral Hall, Temple, Guild Hall, Migration Organization

(责任编辑:丰若非)

^① 据会泽当地的文史资料所述,民国初年,旅居会泽的江南籍同乡在筹建江南会馆时,“选定白衣阁关圣殿前加以扩充改建,拆除前殿天子台,增建书楼、戏楼,从此,关圣殿及殿前部分建筑,即变为江南会馆。”参见卞伯泽著,会泽县旅游局编:《会泽之旅》,云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② 邹永金等编:《邹氏家谱》,2003年7月26日印行,第60页,现藏于云南省会泽县白雾村邹氏家族。此族谱保存了清代、民国时期两本老谱的诸多内容,还誊抄了多通清代碑文,因此对于清代历史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